

唯物史观视域中的口述史方法论探究

王玉平

【提要】 唯物史观是口述史研究的根本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是其根本方法。遵循这一根本方法,必须坚持群众史观,潜入历史情境,对口述史料进行联系、分析、综合的历史考量;必须把握口述史的基本矛盾,即访谈者与被访谈者、真实与建构、微观与宏观的矛盾;恪守做口述史研究的基本原则,即主体性、主体间性、真实性及细节性原则。依据唯物史观来研究口述史才是真正的“大道”。

【关键词】 口述史 方法论 唯物史观

作为一种日益成熟的历史叙事和社会记忆方式,口述史不仅保存了过去发生的事情,能够生动地再现历史,还能通过对口述过程及资料的研究,真实记录下不同时代的变化,为后人重温历史提供生动具体和可考证的口述史料。事实上,口述史是我们对过去的理解与解读,是记录和展示人们对所经历事件的一种文化自觉,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故此,要将口述史提升到历史学科的高度,方法论的研究至关重要。

一、口述史研究须遵循唯物史观之“大道”

从事口述史研究,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深入实际、实事求是,既微观细致,又宏观辩证,让历史亲历者发声,用史实说话,才有利于揭示历史真相,丰富历史内容,才能使我们的研究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一)口述史研究要深入民众之中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由人的实践活动构成,每个人都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历史的创造。唯物史观视域中的口述史研究,必须关照普通民众对个人或社会事件的表达,关照人们在特定时空中的亲身经历和心路历程。“口述史用人民自己的语言把历史交还给了人民。它在展现过去的同时,也帮助人民自己动手去构建自己的未来。”^①口述史关注民众心声,让普通民众成为阐释历史的主体,赋予普通民众撰写自己历史的可能。因此,口述史要致力于用人民自己的语言,帮助普通民众记录历史,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同时必须关注到民众“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历史的,^②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

① 保尔·汤普逊:《过去的声音:口述史》,覃方明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27页。

② 恩格斯:《致约·布洛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6页。

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①虽然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必须依托一定的前提和条件,但也必须明确,这些前提和条件并不只是实现人的目的的制约性因素,同时还是人的目的实现的动力所在。

要正确把握群体和个体的关系、普通民众与杰出人物的关系。历史是无数普通人和众多历史人物的活动的总和。虽然每个人都在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整体社会历史进程并非无数个体活动的简单累加。口述史研究要充分关注不同个体的活动及价值,将个体及其活动融入社会之中,还要注意将创造历史中的主导力量和非主导力量区分开来,这样才能清晰地认识和把握历史。

(二)口述史研究须潜入历史的情境

口述史需借助影像音像等设备将鲜活的口述史料进行妥善存储,而史料的形成又与当时的环境、与访谈双方的准备和现场表现有关,所以“潜入历史的情境”是口述史的基本要素。

“情境性”固然是口述史的基本要素,但常常因其缺乏“准确性”而遭受批评和质疑。比如,人们常举例说:同一个人在不同情境下谈论同样的历史事实,表述会存在差异,这些差异集中凸显在历史细节和对历史的看法等方面。这种由于动态场景变换而造成所述史实前后龃龉的情况,确实在口述史研究过程中时常发生。尽管如此,“情境性”依然是口述史料有别于传统文献资料的一种优势。正是种种特定的“情境性”,将特定被访谈者的历史经历同当下感受叠加起来,描摹出被访谈者的记忆地图和心灵轨迹;访谈过程中的情境被当时的历史时空所框定,通过一定的形式予以保留,本身就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刻,具有特定的历史价值。

(三)对口述史料必须进行联系、分析、综合的逻辑考量

口述史面对的是鲜活的个体,获取的对历史事件的回忆和认知是具体的、生动的,却又是零散的、不全面的,甚或与事实有出入的。这就需要我们坚持唯物史观,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对所获取的口述资料进行思考与改造,使其既鲜活生动,又准确反映历史。

要用联系的观点研判口述资料。联系是客观事物的固有属性,每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都不是孤立的,都与时代、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都是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小片段,所以从被访谈者那里获取到的口述资料,必须被置放于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从多种角度、多种关系中进行对照比较,从复杂的联系中把握其内在的规定性。对比较对象要作具体分析,并将比较结果进行凝炼和升华,通过对各种客观联系的比较分析来界定对象、厘清史实。

要对口述资料进行科学的分析。我们通过口述访谈获得的第一手资料往往杂乱无章、真伪叠加、信息庞杂,这就需要对这些信息进行严谨而具体的分析研究。譬如,关于某历史事件的口述史料,为了印证其真伪,就需要与各位事件亲历者分别进行访谈。“用分析方法来研究对象就好像剥葱一样,将葱皮一层又一层地剥掉,但原葱已不在了”,^②不过在“原葱”消失的同时,事物的真相也逐渐浮出水面。

要将口述资料进行综合研究。分析固然是基础和前提,但综合才是目的,忽视综合的作用,就无法从整体和系统上把握历史。这就需要在对口述资料进行研究时,重视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综合的妙处在于可以跳出无数个“个体”,从“整体”上来把握史实。因为“每一个别情况都有其具体的历史环境。如果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顽强

①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5页。

② 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415页。

的东西’，而且是绝对确凿的证据。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①因此，史料的搜集、整理与考证只是做口述史研究的基础，其主要任务是在丰富庞杂的史料中找出各种历史事件、历史过程的内在联系，做到以小见大，加深对历史规律的认识和把握。这既是唯物史观的必然要求，也是做好口述史研究的基本准则。

二、口述史的基本矛盾

在唯物史观视域中，口述史是一种动态的“活”的历史，是由访谈者与被访谈者的互动生成的历史。口述史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统一体。口述访谈关涉访谈者、被访谈者、访谈内容等诸要素，其中存在三大基本矛盾：访谈者与被访谈者的矛盾、真实与建构的矛盾、微观与宏观的矛盾。此三者贯穿口述史研究过程的始终，并起着基础性、决定性作用。

（一）访谈者与被访谈者的矛盾

口述史基于人与人的对话，访谈者和被访谈者缺一不可，缺少任何一方，“口述”皆不成立。这便决定了访谈者与被访谈者的矛盾是口述史最基本的矛盾。

口述访谈本身就是一种历史研究。访谈者就是历史研究者，须秉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进行分析与综合的理论思考，努力还原历史事件、历史场景；被访谈者的口述是对历史文献的必要补充，尤其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经历者，在他们记忆深处常常保留着大量鲜活生动的历史故事。基于口述史研究的“双主体”性，访谈者首先要认真倾听，做好听众，受访者也要力求全面真实地回忆、叙述历史事实，做好这一研究的帮手，发挥好访谈者与被访谈者双方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就口述访谈的工作过程来看，在工作初始，访谈者是主导者，被访谈者是协作者。因为“访谈者是口述历史访谈的策划者和主导者。他们负责口述历史的整体策划，负责确定口述访谈的主题，负责围绕主题设计具体问题，负责根据主题和具体问题确定并联络访谈对象，负责在访谈过程中向当事人提出具体问题。他们参与并主导了从口述访谈的前期准备到口述访谈过程，甚至后期的访谈整理的整个过程，是呈现口述历史剧情的‘导演’，在口述史工作中起着名副其实的‘导演’作用”；^②一旦开始正式访谈，二者的关系就会发生一次重要的角色转换：被访谈者作为陈述者，变成工作的主导，因为“离开了历史当事人的叙述，根本不可能有所谓口述历史。历史当事人是历史事件的亲历者，是历史记忆储存及其呈现的主体，因而也是口述历史最重要的主体”，^③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访谈者则转变为主动的协作者，其主要工作就是倾听、记录、适时引导、核实信息等。

在整个访谈过程中，访谈者与被访谈者矛盾双方的地位和作用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口述工作的展开进程发生变化，因此，处理好矛盾双方在不同时间节点上的作用和关系是做好访谈的关键。访谈不是简单的一问一答，而应是双方之间的深度交流。访谈者向被访谈者提出有意义的问题，并以客观公正的态度认真倾听，使被访谈者打开心扉、畅所欲言，以获取尽可能详实的口述史料。

① 列宁：《统计学和社会学》，《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64页。

② 左玉河：《口述史的方法论属性与史学研究形态的变革》，《光明日报》2017年1月16日。

③ 左玉河：《口述史的方法论属性与史学研究形态的变革》，《光明日报》2017年1月16日。

确实,“口述历史访谈的过程,是访谈者与当事人通过口述访谈的方式共同回忆和书写某段历史的过程。双方反复进行沟通、修改和订正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口述历史研究的过程。”^①

(二) 真实与建构的矛盾

“建构”伴随口述史研究的全过程。因为无论访谈者还是被访谈者,都是参与创造历史的一份子,都具有历史主体的功能。通过提问、对话来记录当事人的生活故事及其感受的口述访谈,不可避免地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所以建立在口述访谈基础上的口述史研究,既在见证历史,也在建构历史。

其一,被访谈者的讲述是在以个人的方式“建构”历史。

被访谈者的叙事并非纯粹对往事的客观再现,而是基于当下回溯过去的结果。因为每个被访谈者都是以自己的方式讲述历史,在对既往的回忆中,会有遗漏、有添加,有裁剪、有放大,等等。人们有意无意间对历史进行重组、修饰、过滤或遗忘的讲述过程,就是在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建构”历史。个体对于自身经历的记忆和理解,总是与时代语境紧密连结在一起,但在不同的时期,人们对于时代和自身际遇间关系的阐释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因此人们总是有选择性地讲述与自身相关的事件,突出其不同的侧重点,对个体经历、时代背景等所给予的阐释,有着清晰的社会建构的色彩。

但是,口述者的主观性建构在为客观呈现历史设置障碍的同时,也为研究者理解社会中的人提供了独特和珍贵的资料。口述史叙事中最能够引发人们兴趣的,无疑是那些传统文献中较为少见的历史细节。这种口述史料的“主观性”使得历史姿态万千。所以,从被访谈者的建构中,不仅可以获悉个人的生活史,还能触摸到社会的变迁。

其二,访谈者的准备和研究工作也是一个建构的过程。

正因为口述的“主观性”,虚实混杂,故必须对口述史料进行分析、研究和再创作。在口述访谈中,访谈者的工作就是一个建构过程。访谈者从最初的选择被访谈者、准备提纲到进行访谈,既有客观的任务要求,又有主观的规划设计。口述者在访谈者的引领下不断回忆、整理思绪,选择讲述的重点事件、时间节点,描述自己在这些事件和时间节点上的所作所为,并回忆当时的所思所感,把生活的碎片连缀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个体经验的描述,这一过程存在清晰的社会建构色彩。口述资料整理也离不开建构,因为访谈者在研究和建构口述史料时,必须尊重口述资料的主体性和多样性,尊重历史的个性化特征,尊重历史本身的丰富性。在“去伪存真”的前提下,将一个特定人的口述,还原到特定历史背景和历史场景之中,探寻其个体的真实,呈现个人访谈的个性特征,使历史回归本原。对口述史料研究过程的建构,目标是将口述作为第一手资料呈献给阅读者和研究者,是丰富历史而不是改写历史。

(三) 微观与宏观的矛盾

微观与宏观的矛盾,也是贯穿口述访谈及口述史研究始终的一对基本矛盾。

口述史是个体生命历程的独特再现,从主体的角度看,它是个人记忆的表述,而“对大多数人来说,历史和个人的经历很少有交集,对过去的记忆反映的是个体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历史的全景”。^②从被访谈者来说,其个体本身就代表了微观视角;进行口述访谈时的语境也是微观的,口述受到特定的环境、氛围、心情等具象因素的影响。口述访谈有赖于活生生的生命个体,因为“口述历史其实是

^① 左玉河:《口述史的方法论属性与史学研究形态的变革》,《光明日报》2017年1月16日。

^② 唐纳德·里奇:《大家来做口述历史》第3版,邱霞译,当代中国出版社2019年版,第24页。

采访人对受访者个人记忆的挖掘和记录”,^①在某种程度上表达的仅是个人记忆,因此往往凸显出生命个体的色彩。

访谈者获取口述史料的过程也是个体的、微观的。从表现形式来看,“口述历史就是通过记录访谈的形式,收集记忆和有历史意义的个人观点的一种史学分支学科或历史研究方法”。^②口述史从确立选题开始,到访谈步骤的策划、制定,寻找和确定访谈对象,拟定访谈提纲,确定访谈的时间、地点,一直到现场访谈,访谈者记录并整理,直至最后作品出版,都离不开访谈者为启发、调动被访谈者的记忆所做的主观努力。可见,通过访谈者与被访谈者的交流来获得口述史料,从访谈开始就具有微观撰史的特性。

当然,口述访谈还具有宏观性。在唯物史观的视域中,“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③亦即人都是社会的人,个人总是生活在社会之中,一刻也不能脱离社会;社会是由无数个人构成的,每个个体都是社会有机体中的一个细胞。所以,通过口述史呈现的个体记忆就不仅是个体经验的简单累加,同时也是集体记忆的表现。所以,口述访谈不仅仅是微观个体的,更是宏观社会的,因为历史细节的背后是社会层面的宏观信息,包含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信息,反映被访谈者以及访谈者的个人记忆、认知与社会结构、社会变迁间的复杂关系。在口述史研究中,“访谈者越是深入研究自己的实践,就越会认识到,没有一个群体对于过去的了解是全面的。好的口述历史项目必须广泛张罗、搜集各种相关资料,尽可能多地记录下参与事件的各类人物或社群成员的声音。”^④口述不仅为资料短缺的历史事件补充多角度的侧写,还让一些平常的生活细节也展现在世人面前,使历史的大场景更丰富、生动、充实。微观细节与宏观视野就是这样在整个口述过程中不可分割地交融在一起。所以,口述史既是个体的又是社会的,是微观与宏观的统一。

一般而言,我们认识事物,就是认识事物的矛盾,把握事物,就是解析事物的矛盾关系。明晰口述历史的基本矛盾及其关系,把握其矛盾发展走向,对我们做好口述史研究至关重要。

三、口述史研究的基本原则

作为由访谈者与被访谈者双方协同互动而生成的过程,口述史研究始终贯穿着访谈者与被访谈者、真实与建构、微观与宏观这三大基本矛盾的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又相互促进的运动。其运行机制及自身固有的基本矛盾,决定了口述史研究必须恪守主体性、主体间性、真实性与细节性等基本原则。

(一) 主体性原则

主体性是人所具有的特性,即人在从事实践活动时表现出来的能动性、创造性和自主性。口述访谈是为了更真切更生动地理解和把握“过去”,不是单纯指向客体的对象性活动,而主要是指向主体性的活动,是指向特定历史环境中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因而,恪守主体性原则是进行口述访谈

① 陈墨:《口述历史:个人记忆与人类个体记忆库》,《当代电影》2012年第11期。

② 唐纳德·里奇:《大家来做口述历史》第3版,第1页。

③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6页。

④ 唐纳德·里奇:《大家来做口述历史》第3版,第9页。

的基本要求。

口述访谈过程由访谈者与被访谈者这对基本矛盾的相互作用构成。口述访谈中,双方都可以结合自身的认知和经验去解读历史事实、解读口述史料,各自都拥有话语权力;访谈者与被访谈者都要摆正位置,守好各自的领地,尽到各自的职责,既不能失权,也不能越权。两者之间的平衡需要高超的史学技巧方能掌握。比如,唐德刚就曾经产生过困惑,在他看来,撰写口述史的难度要比一般整理史料撰著成书的历史著述要高。在谈及撰写《李宗仁回忆录》的过程时,他曾做过这样的检讨:“他所说的大事,凡是与史实不符的地方,我就全给他‘箍’掉了。再就可靠的史料,改写而补充之。”^①这样做的结果是,追求史实准确的同时,削减了李宗仁对那段历史的主体认知,有悖口述历史的初衷。陈墨认为唐德刚的做法是“把口述历史的受访人当做了历史信息工具,而在有意无意中忽视和压抑了受访人的主体性”。^②所以,访谈者对自身的定位要准确,要尊重被访谈者的主体地位,保证他们的话语权,充分倾听他们的声音,以被访谈者的口述资料为基本素材,保护口述文本自身的丰富性、主体性、多义性。

(二) 主体间性原则

作为社会主体的人,都处于特定的相互交往的社会关系之中。口述访谈是主体之间相互沟通、相互理解的交往性活动,即一种主体间性的活动。口述访谈中访谈者和被访谈者之间的互动,“是一个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双向交流的过程,而非研究者单一的研究过程”,^③这个研究过程需要口述者与采访者共同完成。口述访谈能否成功,取决于访谈者与被访谈者两个主体之间能否建立起友好信任的关系。

既然口述史是由访谈者与被访谈者共同完成的,其成果和意义就是双方共同建构的,“是一种交往行动,是受访者与访谈者共同建构意义的过程”。^④也就是说,口述史具有双向性,成功的口述史,一定是基于访谈的“双主体”之间达到默契沟通的互动过程。被访谈者在进行口述时,要有明确的自我主体性,但不能把访谈者仅当作被动的听者,而应随时进行语言、情感的交流互动。访谈者也要调动自身的主观能动性,用心体验和理解被访谈者的过往,走进他们的心灵,积极主动地进行对话,而不能只充当声音接收器的角色。同样,访谈者在确立自己主体性地位的同时,既要尊重受访者的口述内容,也必须用心去感受对方关于过去的感受,使双方开启一场“心与心”之间的对话。

总之,在口述历史访谈过程中,访谈者与被访谈者在确立各自地位、彰显主体性的基础上,还要注重形成“双主体”之间友好信任的互动关系。

(三) 真实性原则

口述史研究必须遵循真实性原则。无论持何种立场的历史研究者,都不否认历史事实存在的客观真实性,其研究历史的目的,都是尽可能呈现历史事实的客观存在及其发展过程。当然,我们不能回避在口述访谈中,被访谈者囿于客观性制约,或只观测到历史事实的局部,或缺乏对整体性或全面性的认知;还可能由于记忆、知识缺陷等原因造成的信息失真;甚或一些人为因素的制约,比如对人事进行夸张性描述;或者是出于个人的原因,隐去一些不愿为人知的事情,甚至有意识的伪造、纂

① 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下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22页。

② 陈墨:《史学之谜:真实性、口述历史与人》,《当代电影》2011年第3期。

③ 李向平、魏扬波:《口述史研究方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4页。

④ 李向平、魏扬波:《口述史研究方法》,第44页。

改历史事件等,导致口述内容不够准确。但是,对客观因素导致的误差,可以通过增加被访谈者样本数量,完善访谈问题设计,以及加强对口述内容的考证来弥补。对主观因素造成的误差,口述史研究者必须对某些史料的真实性进行必要的质疑,这就需要访谈者掌握专业历史知识并具有一定的辨伪能力,能同时充当检验员、勘误员,辨别口述史料的真伪。汤普逊认为在真实性这一点上,口述历史相比文献资料而言,“可以予以自信得多的回答”,原因就是历史学家的参与。^①

可见,口述既是“不真实”的供货商,也是检验“不真实”的防火墙。口述史学者在研究过程中,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对口述史料进行证伪,运用文献资料进行互证,或者在其他采访中对口述内容进行交互检验,努力呈现历史的真实。即使受访者或有意遮掩事实,或夸大自己在某事件中的作用和影响等,这也是个体经历历史的“真实心理”,如有学者说:“‘不真实的’陈述仍然是心理上‘真实的’。”^②口述史研究者必须辩证地对待这些“心理真实”,因为这种“不真实”反而会丰富事件的复杂性,为历史研究提供多层次的历史背景,扩宽研究者的视野。同时,认真分析口述史的“不真实”,有利于从多层面了解历史事实,从多角度复原历史情态。若从社会学的研究视角来看,事件本身的真实性不是其考察的终极目标,因为这种“不真实”恰恰反映当时情境下各种“真实”的心理,“空洞的套话,来自我们社会的集体无意识及集体意识形态的真实;不愿面对自我的失误或缺陷以及自觉或不自觉地自我修饰或自我美化,来自个人心理潜意识及自我提升愿望的真实(尽管这不过是一种想象的情形,却反映了心理的真实);而个人的情绪记忆偏差,则更是一种心理存在的真实状况”。^③事实上,口述史能够还原的是被访谈者经历的历史真实,并不一定是宏大的社会历史真实。以被访谈者的回忆和阐述为主体的口述史料,无疑丰富了历史研究的内容,也凸显了口述史研究的价值。

(四) 细节性原则

口述始于细节是口述史的一个突出特点。口述史从展现形式上来说,是琐碎的、具象的、个性化的,但事实上,历史“事件永远不可能和事件的参加者和目击者的感知相吻合;而史学家正是要从证据和文件中刻画出他们想塑造的那个事件”。^④虽然在历史的洪流中,社会不断变迁,个人的过往和感受如“一叶扁舟”,但普通大众的回忆同样构成历史的真实。尽管历史细节有很多不确定性或相互矛盾之处,但更容易带有生活的温度和深度,更能体现口述人的真情实感,是我们解读历史、理解历史时不可忽视的部分。

结 语

口述史作为阐释“过去”的一种途径,归根结底必须依托唯物史观。作为历史观与方法论的统一,唯物史观具有双重特性:既是关于历史过程的理论,是历史本体论,又是历史方法论,是观察历史的基本遵循。只有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为口述史研究总的统领,才能记录和展示人们对过往历史和当代所经历事件的一种文化自觉。

将唯物史观运用于口述史研究,能让我们在杂乱无章的口述材料中保持清醒的思考和判断,不

^① 参见保尔·汤普逊:《过去的声音:口述史》,第126页。

^② 参见保尔·汤普逊:《过去的声音:口述史》,第171页。

^③ 陈墨:《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实践与理论》,《当代电影》2010年第3期。

^④ 傅光明:《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人云亦云,不为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所淹没。以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指导口述史研究,既要注重口述者讲述的真实性、细节性和丰富性,又要善于对这些口述资料进行分析与综合。在分丝析缕的基础上,揭示事物的各种内在要素及内在矛盾间的关系,亦即把各种矛盾以及矛盾的各个方面的联系起来,形成对事物的整体性把握和综合性认识,以透过现象,探寻本质,发现规律。

将唯物史观运用于口述史研究,能让我们秉持实事求是这一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既尊重口述资料的真实性,又尊重历史的客观性。将口述史料还原到当时当地的时空背景之中去理解和把握,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尊重历史客观规律,才能防范历史虚无主义。只有遵循唯物史观,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和记述历史,才有助于使口述史研究上升到方法论的高度,将鲜活生动但又琐碎庞杂的口述史料筛检梳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才有助于把握有血肉、有温度的历史真像,揭示更丰富、更鲜活的历史进程。

(作者王玉平,河北师范大学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教授;邮编:050024)

(责任编辑:尹媛萍)

(责任校对:敖凯)

关于召开第26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的通告

第26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拟于2024年10月中旬在南京师范大学召开。会议的主题为“全球化与技术化挑战下的史学理论研究”。会议研讨的主要问题包括:1. 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当代发展;2. 全球史与跨国史的传统与开新;3. 中外古典史学理论与当代史学;4. 新技术挑战下的史学理论研究;5. 全球史学理论研究的现状与趋势。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史学理论研究》杂志与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联合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理论研究中心协办。有意参会的学者可与第26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筹备组联系。联系方式:shixuelilun2024@163.com

第26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筹备组

cultivation and governance and reaching the goal of maintaining local stability. This ideology of governing, along with its stage-by-stage practice, were the core logic of the Qing Dynasty's borderland policies. The Qing Dynasty achieved "cultivate education and unify governance" through "governing according to customs". It should be said that the former was the goal, and the latter was the bridge over which to achieve the goal. This governance logic was mutually supportive and formed a grand strategy known as "Qing Dynasty Solution", representing valuable historical experience in border governance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If we adopt a long-term view to rethink borderland governance during Qing Dynasty, we will find that the "Qing Dynasty Solution" holds a significant po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 and it deserves further in-depth summary.

Research on Oral History Method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 Wang Yuping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s the fundamental guide for oral history research. To adhere to this approach in oral interviews and oral history research, we must stick to the mass line, immersing ourselves in historical contexts, and conducting historical analysis through connection, analysis, and synthesis of oral historical materials. We must grasp the basic contradictions of oral history, that is, 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he interviewer and the interviewee, oral narratives versus constructed narratives, and micro versus macro perspectives. To adhere to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oral interviews and oral history research, we must abide by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oral history research, namely the principles of subjectivity, intersubjectivity, authenticity, and attention to details. Studying oral history based 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s the real "path".

Perspectives, Characteristics, and Limitations of Translated Works on Overseas Late Qing History Research in the New Era // Zhang Deming

Since the New Era, a series of overseas works on the history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have been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in China, covering a wide range of topics, including politics, economy, diplomacy, social culture, and many other aspects. This has had a certain impact on domestic academic circles. Overseas studies of late Qing history often adopt novel perspectives, influenced by new social history, new political history, new cultural history, global history, and other research trends. Most of these translated works employ interdisciplinary methods for comparative research, emphasizing the use of foreign historical materials. They combine those with Chinese materials to create vivid and readable historical narratives. However, some of these works misunderstand or over-interpret historical materials. In terms of theoretical paradigms, overseas studies on late Qing history, represen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have experienced changes between different research paradigms such as "Impact-Response", "China-centric view", and "State-Society". Occasionally, these studies have forced theoretical paradigms onto late Qing history studies. Scholars in China should evaluate these translated overseas works on late Qing history objectively and accelerate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latest achievements from abroad. We should make more efforts to strengthen the excav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overseas historical materials, deepening the study of late Qing history from various perspectives. We should not blindly follow and worship western theoretical paradigms. Instead, we should expedite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for late Qing history research in China.

The Disenchantment and Reconstruction of Historical Figures: A Study Centered on the Research of Alexander the Great by A. B. Bosworth // Cui Lina

Studies of historical figures constitute a foundational and core aspect of historical research. Due to the